

共域世界史

王献华 主编

---

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Wome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

# 父权制与资本积累

## 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女性

Maria Mies

[德] 玛丽亚·米斯 著

李昕一 徐明强 译

入选  
20世纪最重要的  
100本社会学书籍

《第二性》以来  
最具影响力的  
女性主义作品  
之一



# 推荐序

有很多原因都可以解释，为什么新版《父权制与资本积累》会广受欢迎。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本书就被视为女权主义的经典之作，是新近反全球化运动活动家和学者的必读之物。现在，本书与第一次出版时一样具有现实意义，而且有更多的读者欣赏本书的内容和方法。本书提出了一个以“生活生产” (production of life)和反对剥削为中心的世界历史愿景，直接谈到了当前很多人正面临的生活和环境危机。尤其是当强大的群众运动似乎无法带来积极的社会变革时，人们就期待对新范式的探索。

对于那些已经被占领运动和广场运动“打了鸡血”的年轻人而言，《父权制与资本积累》恢复了女权主义的激进内核，在制度化的吸纳和后现代主义对女性共同性的否定下，这些内核已经湮灭多年。本书再次彰显了早期女权主义运动中非常强烈的一种观感，即谈论女性就是触及历史和我们日常生活的根基。正如米斯所说，女性并不是人类中的特殊群体；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中，她们都在这个地球上创造了生命，所有其他活动都依赖于她们的工作。因此，追溯女性受剥削的起源就是要追问，为什么历史“发生了错误的转折”，历史在哪里“发生了错误的转折”，推动世界历史的真正力量是什么，我们身处的资本主义制度蕴含了怎样的事实。

这就是《父权制与资本积累》一书所承担的任务，其结果就是，历史叙述和理论阐释在一个“惊人”范围内得以重建。本书沿着数百年来男性暴力侵害女性的轨迹，跨越空间、时间和学科界限，将狩猎/采集社会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展示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陷阱。在这种延绵不绝的历史发展当中，我们挖掘以性别分工为特征的等级制度及其物质基础，并强调非剥削性社会应当遵循的原则。

因此，从本书中可以获得大量的历史和政治知识。《父权制与资本积累》也给我们上了一堂重要的方法论课程，展示了理论建构的极佳案例。更重要的是，本书结合“家务劳动有偿化”(Wages for Housework)运动的相关理论，将女性的无偿家务劳动界定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支柱，并结合对第三世界农民经济和殖民化的分析，发展了一个理论框架，使我们能够将不同形式的剥削和社会运动放在一起思考，认识到女性的分裂和团结，同时也使女权主义成为一种探索，在这种探索中，我们能够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趋势。

不可避免地，这样一部作品会引起许多问题。有些人可能会对所持的这一论点感到困惑：在历史的开端，出现了一种劳动性别分工，即男性专营暴力和破坏技术，而女性专门从事日常生活和世代生产的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分工巩固发展为“父权制”，在这种制度中，男性对女性劳动的暴力化占有成为生产的主导力量。

这是一个具有挑衅性的论点，颠覆了我们从上学第一天就开始学习的文明故事。我想，一些人类学研究可能会因为找到了相关证据而有所发展。但不管米斯的父权制起源理论能否得到经验细节的验证，她的论点都有不容忽视的逻辑力量。因为它向我们提出了挑战，要求我们解释普遍存在的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行为，甚至让“性别怀疑论者”(gender sceptics)也不得不认识到他们所处环境中也有这种共同点。与此同时，它还揭示了资本主义（此乃“父权制的最新表现”）中被认为富有创新性和创造性的特征，充分显示出了它对无偿占有自然财富，以及女性身体和劳动成果的寄生性依赖。

正如米斯所证明的那样，只有随着资本主义的来临，暴力作为一种经济力量才得以普遍化和强化，这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制度。正如她所说，世界体系的形成使资本主义能够向外剥削，加剧殖民地的分裂，加速资本主义对地球自然财富的破坏。在这一背景下，《父权制与资本积累》一书最有力的部分之一，是其对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特征——猎巫、奴隶贸易、殖民化——与当今世界经济重组阶段特征之间连续性的

分析，表明了“一端的发展始终意味着另一端的不发展”，同时也表明，不能仅仅将“原始积累”限定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相反，“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发展各个阶段的基本内容，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永恒的过程。

这是自《父权制与资本积累》第一次出版以来，社会和政治发展一次又一次证明的“真理”。本书断言，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全球扩张与暴力侵害女性行为的升级——作为对女性抵制剥夺她们身体和劳动的惩罚——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不仅成千上万的女性和许多年轻男性继续被奴役、被扼杀于“自由出口区” (free export zones)——我们这个时代的贫民工厂，近年来，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也大大增加，“杀害女性” (femicide) 一词现在甚至在政府报告中也普遍使用。在意大利，2013年的法律条款还将“杀害女性”列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地，我们目睹了猎巫行动的死灰复燃。

值得赞扬的是，在描述“父权制资本主义”所释放出的破坏性力量时，米斯并没有弱化她的批评，也没有提供快速解决的方案，反而是证明了一个日益增长的认识：无法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革。

当前，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也会承认，人类再生产本身也是工作，而且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工作，几十年的女权主义写作和运动已经消除了与此有关的任何疑虑。更具争议却又在当今社会背景下更为重要的是，在技术对我们生活的控制变得如此有力的情况下，米斯没有将机器完成所有工作视为人类解放的条件，尽管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成熟工业化社会的一个梦想。她坚定地指出，这样的梦想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产生压迫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维持这种剥削制度的社会关系。

对于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尽管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排斥越来越多，但这些人仍然迷恋它的技术生产，常常认为他们的权力是通过“脸书”或“推特”获得的。对这些人而言，事实上也是对我们所有人而言，《父权制与资本积累》这本书都是必要的政治指南。它不允许我们忘记新技术的生产成本、它们释放的暴力以及资

本主义技术的普遍化对地球生产力的破坏性。

在这方面，历史也站在米斯分析的一边——在福岛事故后的世界里，持续工业化的梦想已经成为人类的梦魇。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反应证明了米斯的观点，即真正的革命主体不是计算机程序员和其他机械化代理人，而是数百万每天靠不到一美元维持生存的女性，这些人完成了维持生计的工作，创造了更多合作形式的社会再生产。正是她们的隐性存在，并且每天都在努力创造不受资本主义积累逻辑支配的生存形式和社会关系，赋予了米斯这本书巨大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父权制与资本积累》毫不让步地描绘了资本主义的破坏力，但并没有鼓励任何形式的历史悲观主义。本书坚信，资本主义如此深刻地威胁着我们的生活再生产，但它并不会让我们俯首称臣，相反，反抗将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出现在人类的议程上，直到资本主义的破坏力走向消亡。

西尔维娅·费代里奇

本主义技术的普遍化对地球生产力的破坏性。

在这方面，历史也站在米斯分析的一边——在福岛事故后的世界里，持续工业化的梦想已经成为人类的梦魇。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反应证明了米斯的观点，即真正的革命主体不是计算机程序员和其他机械化代理人，而是数百万每天靠不到一美元维持生存的女性，这些人完成了维持生计的工作，创造了更多合作形式的社会再生产。正是她们的隐性存在，并且每天都在努力创造不受资本主义积累逻辑支配的生存形式和社会关系，赋予了米斯这本书巨大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父权制与资本积累》毫不让步地描绘了资本主义的破坏力，但并没有鼓励任何形式的历史悲观主义。本书坚信，资本主义如此深刻地威胁着我们的生活再生产，但它并不会让我们俯首称臣，相反，反抗将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出现在人类的议程上，直到资本主义的破坏力走向消亡。

西尔维娅·费代里奇

# 前言

《父权制与资本积累》这本书曾于1986年由泽德图书(Zed Books)首次出版，现在本书再次出版，我感到很高兴。但需要扪心自问的是，本书在今天还有意义吗？如果有的话，又为什么有意义呢？在一个危机和战争接踵而至的世界中，我的分析和结论是否依然稳固？自1986年以来，又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我的第一个问题包含以下方面：在一个自由贸易支配着所有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世界里，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概念是否仍然有效？而且，正如我在1986年写的那样，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是否仍然相互关联？我对资本主义父权制下女性劳动的分析是否仍旧不变？对女性、自然以及其他殖民地的暴力是不是依然没有从文明社会当中消失？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想说明我是如何发掘父权制、资本主义、对女性/自然/殖民地的剥夺等概念的。有一件事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我并不是坐在大英图书馆里，通过阅读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来获得见解；而是通过参与一些社会政治运动，特别是女权运动，还有学生运动、生态环保运动、和平运动以及后来的反全球化运动来获得的。事实上，写作和阅读是在这些斗争中和斗争后进行的。这意味着实践是在理论化之前进行的。对于女权运动来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尤为如此。因为对于为什么女性仍然被压迫、被剥削，为什么女性不能获得与男性相同的报酬，当时的书籍并没有做出有效解释。

《父权制与资本积累》是行动与反思、经验与理论交织过程的产物，但它也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写成的，当时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特别是女性，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我很幸运地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遇到了正确的人，这些人看到了改变现状的需要，并相信他们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父权制与资本积累》是这些不同情形相

结合而生出来的“孩子”。

在下文中，我将描述这个过程的主要阶段，当时我发现了父权制的含义、资本主义是什么、为什么这两者有必然联系以及这种“联姻”的后果是什么。

1963年，我在印度浦那(Pune)的歌德学院(Goethe Institute,GI)担任讲师。学校的学生，无论男女都来自印度各个地区。男人想学德语的原因很清楚：他们想在德国找份工作或者继续学习物理学或其他科学。但是，为什么印度女性想学德语呢？德语对她们有什么用呢？我做了一个小调查，后来以“为什么是德语？”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Mies,1967)。

我对男性的假设是正确的，但女性的答案却让人吃惊：她们学习德语是因为想推迟“谈婚论嫁”(marriage talk)。我想知道那是什么。她们告诉我，她们都不得不接受包办婚姻，由父母决定女儿嫁给哪个家庭的哪个男人。在所有中上层和中下层家庭中，这样的包办婚姻是惯例。在这些决定中，新郎和新娘都没有什么发言权。在更传统的家庭中，他们甚至不能相互见面。重要的是种姓、阶级、家庭地位和经济状况要门当户对。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在这些“谈婚论嫁”中，最大的困难之一都是关于新娘家庭必须向新郎家庭支付多少嫁妆的协商。许多有多个女儿的贫困家庭为了给女儿找新郎会债台高筑，即使是现在也依然如此。另外，一个嫁不出去的女儿是没有经济保障或社会地位的。她是父母的耻辱。尽管这种情况今天已经改变，但包办婚姻和高额的嫁妆要求仍然很普遍。然而，在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中，只要女儿还在上学，她们就可以“推迟”谈婚论嫁。因为教育在印度中产阶级中具有很高的权重，即使是对女性而言，也同样如此。因此，只要他们的女儿正在攻读学士或硕士学位，父母就不会开启“谈婚论嫁”的议程。当然了，她们最后还是不得不嫁给一个她们通常不认识的男人。

我当时还不知道“父权制”这个概念真正意味着什么。但是，与学生的这些谈话，让我第一次体验到了在父权制社会中做一个女人意味着

什么。她们使我看到了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男女之间的父权关系。但那时候我还没有认识到，其实父权制并非只存在于印度。

从世界著名的人类学家伊拉瓦蒂·卡夫(Iravati Karve)那里我了解到，我从学生那里听到的只是整个父权制社会和家庭制度的一个特点，这个制度在印度次大陆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从那时起，我就想更多地了解这个制度。因此，当我在1968年回到德国时，我想研究这个问题：为什么现代印度女性仍然受到父权制家庭制度的压迫？我去了科隆大学，见到了社会学系主任、国际知名的家庭社会学家勒内·柯尼希(René Koenig)教授。我向他讲述了我印度的经历，以及对进一步研究现代印度女性的兴趣。当时，德国还没有一所大学教授妇女研究的课程，更不用说是现代印度女性的研究了。柯尼希教授对这个话题非常着迷，他说：“你为什么不去读这个方向的博士呢？”我回答说：“如果有可能，那我就做。”

我回到了印度，对现代中产阶级女性的困境和斗争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证实了我五年前已经观察到的情况，即父权制是一个与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有关的整体性制度，它决定了女性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生。我学到的另一点是，尽管有“现代化和发展”，但父权制并不是过去的事情，在今天父权制仍大行其道。我的论文写的就是现代印度女性的斗争和困境，并以“印度女性与父权制”为题在印度出版(Mies,1980)。

然而，当我研究印度父权制中的女性地位时，我还发现了德国的父权制！

在一个正确的历史时刻我回到了德国。1968年的德国出现了两个新的、决定性的社会政治运动：学生运动和新女权运动。这两个运动都冲击了德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学生运动开始了对家庭、大学、教会和国家等既有机构的“反权威”斗争。学生们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自二战结束后，这在联邦德国一直是禁忌，并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作品。女权主义者攻击家庭法，特别是禁止

堕胎，以及对女性的暴力，殴打妻子、强奸和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我们并没有尝试阅读有关女性受压迫的基础书籍，因为当时还没有，但我们开始用行动来抗议对女性的压迫。通过这些斗争，我发现印度女性和德国女性的处境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两种文化中，女性都比男性低贱。在德国，女性在经济上也依赖于父母或丈夫。在教育、工作、薪酬和现实法律状况方面，男女之间并不平等。只有在丈夫同意的情况下，女性才可以得到一份工作。女性的“正常”定位是依附性的家庭主妇。而且，德国女性同样也是男性暴力的受害者。

与那些加入学生运动的大多数学生相比，我的年龄大得多。学生们组成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圈”。在那里我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劳动、宗教、家庭和革命的著作。这一切让我大开眼界。

从一开始，德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就是国际妇女运动的一部分。我最感兴趣的问题就是男女之间的劳动性别分工问题。关于家务劳动在资本主义家庭和社会中的作用的辩论，对我理解资本主义具有决定性意义。1980年左右，我开始参与这场新辩论，并开始更仔细地阅读马克思，特别是他对工作的看法，女性在家庭中的工作尤甚。许多年来，这场辩论是国际女权主义讨论的中心。马克思称家庭主妇的工作为“再生产劳动”，而男性在工厂的工作是“生产劳动”。

这时我开始写《劳动性别分工的社会起源》，这是一篇收入《女性：最后的殖民地》中的文章，该书是我和朋友维罗妮卡·本霍尔特—汤姆森(Veronika Bennholdt-Thomsen)、克劳迪娅·冯·韦尔霍夫(Claudia von Werlhof)共同撰写的(1988)。它被全世界的女性广泛阅读、广泛讨论。我们三人都曾在“第三世界”国家工作和学习过——维罗妮卡和克劳迪娅在拉丁美洲，我在印度。因此，我们不仅研究了资本主义对欧洲和美国女性的影响，而且还研究了资本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女性有什么影响。我们将其概称为殖民地。维罗妮卡和克劳迪娅都特别关注家庭主妇的工作和南美农民的工作之间的相似性。我对印度也做了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父权制与资本积累：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女性（共域世界史）》[德]玛丽亚·米斯. p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4989.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